

战乱年代

沙松寿、孙佩钧、沙耆



徐锦华



79岁的沙天行向记者讲述他父母和爷爷在战乱时期的往事。



1936年春，沙耆与孙佩钧举行婚礼。

《600个孤儿的母亲》(详见本报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报道)刊发后，沙松寿的孙子、沙耆与孙佩钧的儿子沙天行专程从上海赶来。

79岁的沙天行向记者讲述了国际灾童教养院两个重要的人物——沙松寿、孙佩钧与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故事。

说到他们，又不得不提天才画家沙耆。

几年前，沙天行曾驾车寻找教养院的旧址。那是母亲和爷爷奉献过光热的地方，也是自己咿呀学语时待过的地方。

从溪口一路打听，没有人知晓附近曾有一个教养院。沙天行寻了整整一天，终于经一位古稀老人的指点，才在暮色青山中找到泰清水库，也就是教养院的故址。

山路迢迢，树木古朴，荆棘丛生，当沙天行站在泰清山前，俯首凝望碧涛中苍茫的倒影，几十年的记忆碎片，似乎在山巅水崖间拼凑起来。

记者 陈也喆 文
记者 崔引 摄

老照片由沙天行先生提供

美丽的独立女性



孙佩钧和沙天行母子合影。

见过孙佩钧的人，都说她是个美人。身材苗条，肤色白皙，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笑起来酒窝深陷，甜美迷人。性格也俏皮活泼，惹人喜爱。孙佩钧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女

子。学生时代，她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独立女性。

在中学读书时，她曾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学潮，与军警搏斗时受伤，被她的父亲勒令退学。

那时候，沙松寿与竺梅先合股办厂，举家搬到了杭州。

孙佩钧休学期间，沙松寿回到家乡，一眼看到她，就认定她是自己的儿媳妇，把她介绍给自己那个只知道画画的儿子沙引年。

沙引年就是沙耆。“沙耆”是族兄沙孟海给他取的艺名。

当年，沙耆在沙孟海的推荐下，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师从徐悲鸿先生，他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前途无量。

沙耆比孙佩钧大两岁，她柔情缱绻，他风度翩翩。两人初见面，眼里都是无尽的深情。

1936年春天，他们在杭州西湖饭店举行婚礼。那一年，孙佩钧20岁，沙耆22岁。

婚后不到半个月，沙耆回南

京继续上学。

孙佩钧则在华丰职工子弟小学当老师。在那里，她第一次把自己的音乐天赋显露出来，边弹琴边唱歌。去国际灾童教养院前，她已经是一位娴熟的音乐老师。

婚后那年暑假，沙耆回来了，却眉头紧锁，心情沉重，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闷头画画。

孙佩钧以为丈夫学业过重，便没有过问。那年暑假过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过了几个月，沙松寿从南京回来，告诉孙佩钧要送沙耆去比利时留学。

这个消息对孙佩钧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婚后聚少离多、两地分居也就算了，还成了异国婚姻，而且是在自己最需要丈夫关怀的时候。

孙佩钧要求沙耆等她生完孩子再走，沙松寿却没有同意。

那时候，孙佩钧还不知道，自己的新婚丈夫是个被通缉的政治犯。

沙松寿主动请缨

沙松寿是鄞县沙村人，原本是一位山水画家。他与竺梅先共事多年，是华丰、民丰造纸厂的股东与总务主任。

他极富才情，国画、诗歌、建筑、雕塑，样样精通。山涧春水，水中游龙，在他笔下惟妙惟肖，极受竺梅先的赏识与尊重。

民丰、华丰二厂扩建，都是沙松寿一手策划的。泰清寺翻修教养院的事，竺梅先第一个就想到他，可是沙松寿当时已年近耄耋，再请他出面做这个苦差事，实在是过意不去。

然而，沙松寿知道竺梅先的苦恼后，主动请缨改建泰清寺。

1938年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沙松寿带领一批工人赶赴泰清山上的泰清寺。

到了泰清寺，沙松寿却傻了眼。

庙宇没有香火，久无人烟，远远地就散发着一股恶臭。走进门内，蛛丝网结，墙壁脱落，穿着长袍走过，满地都是扬起的尘土。

更要命的是，还有山林野猪穿堂而过，吓得工人们都不敢开工。

可是，既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就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沙松寿出谋划策，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工，两个月后，废旧的泰清寺整修一新。

寺院外，还扩建了9个教室，7个寝室，2个大饭厅、图书馆、盥洗室、理发室、浴室、厨房、洗衣房、缝纫室、大礼堂、办公室等。

沙松寿还别出心裁地在通往山顶的杉木长廊上，用树根雕刻成各种姿态的飞禽走兽，给冷僻的山坳平添了许多生气。

深山闭塞，为了与外界互通有无，沙松寿在教养院内设了一架电台。采购衣服、药品、文具等，只需打份电报给宁波的船务报关行就可以了。

泰清寺的空旷之处，被山后一条潺潺流来的琅溪分成两部分，一片是农场，一片是运动场。

那绕寺蜿蜒的小溪，清澈见底，是天然的游泳池。

望着重修一新的教养院，沙松寿写下一首诗《琅溪国际灾童教养院》：

春入琅溪草自长，新开讲席延朝阳。
歌声晓夜撼山岳，琴韵悠扬感万方。
茅屋新成佳宾集，草堂初结午风凉。
莘莘五百来何方，自诉无家又无乡。

抽屉里的判决书

婚8个月，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足4个月，转眼就要天各一方。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是一生。从此以后，沙耆与孙佩钧再也没见过面。

沙耆出国后的一天，孙佩钧忽然在抽屉里发现一张上海法院的判决书。

正好这个时候婆婆走进来，她发现孙佩钧拿着那张判决书，惊慌失措地夺了过去。

反倒是孙佩钧安慰婆婆：“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也没有必要瞒着我……”

1937年5月，孙佩钧腹中的骨肉沙天行出生了，孩子的父亲却远在异国他乡，鲜有音讯。

去比利时留学前，沙耆曾栖身于前塘河的乌篷船上。仰望满

天星斗，波光在耳畔荡漾，他随

手在纸上涂鸦了一幅夜景。画旁还有他写的一首小诗《横溪夜泊》：“水村人语近桥多，卧听邻舟发棹声。偶起开篷看夜景，满天星影洒清河。”

沙耆没有想到，没过多久，他的父亲沙松寿与妻子孙佩钧就在横溪附近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工作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沙耆曾写信给父亲，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被沙松寿一句话就顶了回来：“现在打仗，要的是武夫，要你

这个画画的有何用？”那年8月，上海沦陷。孙佩钧带着儿子和婆婆回到鄞县沙村。沙松寿留下来，与竺梅先商量，将造纸厂迁到偏远的云南。